从彭立人烈士被捕说起

何　铮

一九四九年六月，我家住学田湾四十五号冯均逸之女冯智兰家的楼上。在初夏之夜十一点左右，内政部（中统渝区）特务二人以“收电报”骗我下楼，我随即被押到枣子岚垭冉家院（现枣子岚垭正街房地产开发公司新楼）见“区长”王难三。听见隔院楼下有人惨痛呻吟，该区的“行动科长”张序彝与前科长谭慧浓恐吓我说：“我们在请彭立人吃‘辣椒水’。何胖子，今后捉到你也一样！”我才知道原来是巴县中学的彭立人同志被捕了。

我只认识立人的父亲彭丰根、姑父寿进文、姑母彭毓炯及姑友候枫，却未与彭立人同志见过面。我想，胡春浦同志在渣滓洞当年出狱，农历四月十九日到我学田湾家，同年五月初二日才离开，王难三岂不知是我的后任蒋永炳聘用的彭，却偏要问彭立人是否由我安排在巴县中学？欲借彭口证我以联春浦等同志，谋求新立大案的心情，是可以揣测的。因此，我极力压抑我认识彭父、彭姑想保释彭立人的愿望，更不谈我和任一相识的进步人士的关系，笑听软扣侧击，到鸡鸣几次，当他们吃鸡蛋挂面作“宵夜后”，我才决定请求回家。

我向韩觉民同志说我要去成都，他借给我四十块银圆去蓉后，我住在王彦立同志的南外新居里。我当时会见了隔邻的春浦、宗华及随时在彦立家的黄季陆、王宁荚、林文聪等。我曾向彦立分析红军入川可能会先夺取南岸山头以附重庆之背，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里的敌对者就会出通远门退走。要迎接解放，将先在重庆。我把这个想法及我妻周远芬即将分娩的情况向胡春浦、王彦立两同志作了说明。

在我回渝以前，我曾一再商劝“大中社”的张元佑（现在成都红照壁“黄埔同学会”）及刘国辉：在解放军入城前，以他们县、区“分社”的人力，捍卫成都秩序。并把张、刘愿意接受考验的意思面告彦立，仅得答、“必要时将予联系。”

阳历八月，我接受了父友朱英仲——新任江北县田粮处长的委聘，任他的秘书我得先行返渝。于是告别了春浦、彦立，春浦派了熊倬云同志送我上车。九月，我借我家迁渝将近百年的残余世谊、及与我在吴淞中国公学龚旻华的交好关系，大得江北县长王广来及县党部书记长黄远仁的青睐。又借我能讲小点广州话，与黄的广东夫人随时搓小麻将，得时时进入黄家。仅有一条小街的江北县府所在地——大竹林，不少人都和我很快熟识了。

十一月廿四日，在江北县长兼“反共保民师长”王广来的指令下，各机关包括“县大队”一律随县府撤退，我们乘木船上行，当晚抵水土沱。途中，有的船曾受到共产党便衣武装的检查。我听各机关人员的谈话，大多对县府不顾所属机关员工生活而表示不满。我去水土沱街后看我妻周远芬的堂三姐远清的丈夫、在“粮食部”工作的何叔钧，并商请他与镇长周乐君商量，说服周及几个士绅出面迎接解放。周乐君对自己的实力作了一定的估计后，号召士绅：在镇上大茶馆楼上宣布全镇迎接解放。十一月廿五日，水土镇响起了激荡人心的“鸣锣通知”。有哪些人到场，现已记不清了，此时，我鲜明地表示，拥护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在会上，并当众拒绝了王广来派人交来的盖了县府印信的“即拨交军粮三百石”的“命令”。随即

约了大竹林士绅王复禹商议成立“江北县解放委员会”。

十一月廿七日晚，巴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沈嘉猷和井口乡县参议员江件舟两人从大竹林经过，到田粮处来问我走不走？我借口说，我还要接一支粮船，不能走。我看见他俩匆匆逃离的狼狈相，觉得可怜；又想起沈嘉猷曾强提我从巴县教育工会竞选县参议员的票箱的霸横情况，又感到可恨，我向着他们的背影不禁摇头，吐出一句：“你们到哪里去？”

十二月三日晚，璧山专区专员韩明同志带了解放军六人到大竹林，住到小客栈里，专员找店家通知我去，他一面洗脚，一面问我的情况。我向他递交了江北县田粮处职工迎接解放签名书。他从身上摸出了《中原军区征（借）粮草暂行办法》，并叫我投入江北县的征粮、支前工作。

为了在解放军尚未进驻江北县，人民政府还未成立时开展工作，我和王复禹在我学田湾住宅写好请求对《江北县解放委员会立案审查报告》，交到当时在人民路范庄的西南军区去。我们从邮电局大楼左侧上去，代表军区直属党委接见我们的是张文澄同志。我向他谈了我属胡春浦、王彦立关系，他曾问我：“彦立现在哪里？”我告诉他还在成都。他勉励我们要很好支前。从张文澄同志那里出来才刻制图记。这时，国民党飞机还在渝市上空扫射，我们当时在路边蹲伏。有关建立“江北县解放委员会”的简况，报纸曾予揭载。

在学田湾家中，我曾婉却了冯均琏先生约我同往南岸迎接解放军的邀请。后来听说他们的车子在“渝舍”（即现在少年宫）附近为先进城的解放军便衣呵令停车时有死伤，冯均琏死，我到观音岩右面山上医院去看过受了伤的邻居汪观之。巴县的刘尚颜、巴县中学学生陈廷坤等此时都来过我家，因我住江北而没有见到。

巴县的周朋凯为成立“巴县解放委员会”，约我到马王坪介绍经验。我深知这个人较重权、钱，在送了征（借）粮草暂行办法给他参考后，只向他说：“为更好协助政府，有利将来向县人委移交，最好不作主任委员。”我在马王坪那天，连李灿东都未看见，记得只会见了跳石乡的严纪陵和旧参议员李南居。

十二月底，赵寿亭同志到江北县任县长。多冷的天气，仍然自己去河边洗衣、被，一时街谈巷议，传为奇闻，争相效法。县人委接着成立。公安局是武局长，我向他呈递了一份粗略的《自传》，后我在财粮科工作，科长姓刘。

在“江北县解放委员会”即将移交，县人委成立之前，我曾在大竹林登台扭了一次秧歌，因体胖化装一个商人，颇得观众及川东行署来的领导的好评。这时，后来作过江北县委副书记的郑坚白及其夫人魏明同志也回到文化馆了。

一九五〇年初，我参加王家、古路等山区乡镇的征（借）工作。我和十个解放军（班长姓何石家庄文艺演员入伍），一个“军大三分校”毕业学生一起，每日翻山越岭，宣传征(借)支前，掌握政策，搜集敌情，当时有的地主及其武装多在山上。我们粗茶淡饭，晨夕奔走，确是够忙的。记得肖家乡曾发生过一起路劫盐商案，出事现场，适当通邻水等县要冲。为了平息歪曲宣传，扫清征（借）道路，我分析当夜值勤哨丁的用枪情况，推理为哨丁作案，就和解放军史柱顺同志（后见报载是南充军分区模范），肖家乡的一位青年干事，持老式步枪一支，一行三人赶到匪窟，对六个（一个妇女是家属）人进行盘问教育。起初，他们心情紧张，答语流於外表，我看见后就脱鞋坐床，把气氛降低。他们明瞭了坦白从宽的政策后，交代了作案经过。这个轰动山区的抢案，一天就破了案。

一九五〇年四月六日，我去川东行署民政厅训练大队学习，正翻上去民政厅山顶，看见在川东党校学习的巴县中学一九四九年的事务主任周行野同志。他看见我，高兴地招呼："是到党校学习？"我告诉他是在民政厅。（当时厅长是刘湘屏、李明远，大队政治主任是张杜平，中队长叫孙立锁。）和我同中队的有巴县县长杨思慈、教育局长陈安国、以及"政大"师生等。

到一九五〇年九月，我在大队正式结业。记得当时我在洗衣、沐浴的小溪，曾写过如下一首小诗："喜将积垢涤清泉，笑指流萤傍草边；不定因风同败絮，沾沾自许亮如钱。"

我被正式分配到工作单位时，大队给我的《供给关系》上注明："该员在我队同革大学员待遇。"这是我毕生难忘的第一次受训。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二日应
政协巴县委员会约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三育小学忆

屈大扬

三育小学创办于1945年秋，校址在巴县南彭乡白云寺，是中共地下党建立的一个据点。南方局青年组副组长朱语今指派屈大扬任校长，吴昌济（后改名吴立行）任副校长。教导主任先后有陈启明、唐叔彬、杨绿章、周渭川、杨全祖等同志担任。教师多数是由南方局指派来校的地下党员、解放社社员和进步知识分子。1949年该校的党组织关系转属巴綦南边区特支，建成南彭乡党小组。有党员5人、社员4人。

(一)

1949年春，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我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势如破竹。西南敌特的末日来临，革命胜利曙光在望。学校在“发动群众、积聚力量，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针指引下开展了一些工作。

一、积聚力量，培养干部。周渭川同志根据特支指示，于1949年7月授意三育小学校长屈大扬出面筹建了“南彭乡青年联谊会”，作为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入会的有陈玉洁、赵正华、彭渠、彭梁、龚方书、彭子玖、彭裕祥、赵正荣、石孝恒、石孝明、石孝廉、石崇书、石崇碧、石崇周、石崇鑫、屈大渝等16人。屈大扬任会长。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解放社，又发展了张正伟、杨麟书、石孝承、龚方文、彭子言等20余位社员。这些进步青年经过培养，政治觉悟得到提高，解放后绝大部份

参加革命工作，成为乡、镇政权和乡镇中心学校的骨干。

二、开展宣传，发动群众。以三育小学为中心，在方圆八里左右的地方，分别租借房屋，创办了“陕竞坪”、“屈家沟”、“七甲沟”、“一把伞岚垭”、“红岩头”、“鱼塘湾”等7所农民夜校，分布在南彭、忠兴、界石三乡的四个保，学员八百多人。三育小学的校长、主任分别兼任夜校的校长、主任，教师统一分配到各所夜校任教，教材自编，利用夜校阵地，对农民进行革命教育，“谁养活谁”的阶级教育，宣传党的农村政策，揭露国民党“二·五”减租骗局，培养积极分子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抗租、抗丁、和抗税斗争。在此基础上，根据特支书记任仕学的意见，于1949年夏天在南彭乡第七保农民屈银合家成立了秘密农会，参加农会的有屈银合、屈大辉、屈大瑜、屈大淮、申守明、甘伟德、雷贤文、胡国平、屈万福等40余人。这些积极分子，解放后不少的参了军，参加了工作。

三、搜集情报，提供依据。1949年春，中共中央情报部西南站负责人之一吴立行同志，从中央转经南京、武汉来渝，发展屈大扬、蒋达二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情报部情报员，由该部西南站在重庆市的负责人张祥娴同志领导，张是吴立行的假情人（革命需要），原重庆市市长张笃伦之女，大特务徐鹏飞的姨妹。当时她任职在中央财税部西南稽征处。屈大扬参加情报工作后，一方面依靠特支的任仕学、周渭川去重庆搜集一些情报，另方面以吴立行、张祥娴与徐鹏飞的关系和屈与西南长官公署第八组少将组长石子雅、国民党中将军官彭子言等的同乡、亲戚关系，经常打入长官公署秘密取得了《国民党军队驻扎西南地区分布图》和国民党敌特掌握的《中共地下武装及党员分布图》。以及国民党在重庆的驻军番号、数量和组建“反共

保民军”等军事情报，按规定上报，为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重庆等地提供了可靠依据。

四、开展统战、掩护组织。南彭乡地下党组织借屈大扬与当地的上层人物有师生、亲属关系，采用请客送礼等方式，邀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担任三育小学的董事会长和董事等职，有利于掩护组织和同志。如该校的董事长就是原国大代表、县参议员石子雅、校董有龚永龄（国民党巴县党部书记长），陈兆麟（市立人中学校长、陈果夫的学生），石孝先、喻清和、卢俊卿（都是市、县头面人物）等10余人。通过这些关系，基本上消除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三育小学这个革命据点的怀疑。解放前夕，根据特支指示，充分利用三育小学董事会这个组织进一步做石子雅、龚永龄、彭子言等人的工作，收到一定的效果。彭子言不仅未回部队复职，而且参加了“解放社”，石子雅、龚永龄率残部在歇马场起义。

五、经营商业、筹集资金。为了筹集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以三育小学校长名义，于1948年夏至1949年秋，在南彭、石岗乡做木材生意，一年左右赚黄谷三、四万斤。同时还在南彭乡街上开办了“民生号”商店，由党员龚堪国任经理，三育小学毕业学生石崇书、石孝廉任营业员。我们将赚得的钱用于革命。

六、控制反动武装，做好配合解放的工作。1949年6月，上级指示：“要控制当地的反动武装，搞好护厂、护校和维护社会治安迎接解放”。三育小学党组织根据这一指示，一方面多次作南彭乡乡长彭君霖和乡队副、“反共保民军”×连连长石崇彬的工作，要他们在解放时按兵不动，不准向解放军开枪。他们答应了这一要求，“反共保民军”果真在解放南彭乡时未放一枪，全部放下武器回家了。另一方面，在三育小学所

在地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以周渭川、屈大扬在南彭乡组织的30多人的秘密农会为基础，掌握长短枪30余支。当时南彭新闻会计专科学校的学生，进步青年张正伟、杨麟书也参加了这支武装。这些作法，对于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迎接解放都起了作用。

（二）

解放前夕，三育小学地下党组织将所在地的党员、社员和全校教职工，从力量上作了调配，全力迎接解放。

一、组织群众欢迎解放军。1949年11月28日上午，解放军抵达南彭乡。“民生号”商店经理龚堪国带领商店职工和街上群众，热烈欢迎解放军，燃放鞭炮并拿出糖果、香烟慰劳解放军。由于解放军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曾付给商店伍万元人民币（折现在的伍元）。在“民生号”商店的带动下，全街群众都放鞭炮、送茶水、一时锣鼓喧天，掌声如潮，其场面十分壮观。三育小学的周渭川、屈大扬等同志立即召集师生，打着热烈欢迎解放军的横幅，唱着革命歌曲，敲锣打鼓，跑步赶至上场口迎接亲人。接着，学校的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田间村庄，贴标语、作讲演，向群众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动员复课复市，使街市秩序很快恢复正常。宣传队的负责人是陈玉洁、杨全祖、温馨等人。当天晚上，在三育小学举行了庆祝解放大会，会场里挂上五星红旗。（这旗是由唐叔彬、陈玉洁在建国大典前夕亲手制作的。）参加大会的有：在校全体师生，农会会员等500余人。会上，周渭川同志作了庆祝解放的报告，屈大扬同志宣讲《约法八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表演了文艺节目，教职工还聚了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协助解放军顺利进军。11月29日上午，周渭川、屈大扬去南温泉卢家花园经棒桥附近，同解放军某部负责人接头，给部队提供了有关情况，由于先头部队在南温泉受阻，一天后，部队负责人要我们绘一张迂回南泉的路线图，当时我们提供了两条路线：一是，南泉→鹿角乡→八公里（即二塘一带）；二是，南泉→界石乡→公平乡→红炉乡→大窝铺→鱼洞溪，然后分路进发至南温泉。部队采纳了第二条路线。当天晚上，由周渭川、屈大扬作响导，将部队带到大窝铺川黔路上，部队随即解放鱼洞溪和土桥。过一日，驻南泉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眼看将被解放军包围，即迅速遁退逃窜，南泉宣告解放，这给解放重庆扫清了障碍。

三、建立组织开展支前工作。特支指示，于12月3日由屈大扬出面建立南彭乡解放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支前和维护治安，抓四件主要工作：一是组织群众迎接解放军。二是组织宣传。由教师杨全祖等人组织学校师生到街上、农村宣传有关政策，并教群众扭秧歌、打腰鼓、唱革命歌曲；三是办理解放军需要的粮食、柴草和猪肉供应工作。由赵正华、龚方书、赵正荣、彭渠等10多名解放社社员成立了专门的支前机构，组织人力，打开旧政府和地主的粮仓，日夜加工运送，以保证过境部队的粮草供应。在20天里，共运送大米二十多万斤，猪肉两万多斤；四是维护治安。解放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召开了旧乡、保人员会议，再次给他们交待政策，要他们将乡、保武器全部交给委员会委任的乡大队长和保武装队长，得全力搞好支前和维护治安工作，以立功赎罪。

（三）

川东、重庆地区解放后，三育小学据点的主要任务是协助

解放军进行接管、搞好政权建设。

一、胜利会师共商接管建政大计。1949年12月上旬，周渭川随同特支书记任仕学到马王坪参加了中共巴县县委号开的会师会，讨论了如何接管和建立新政权的工作。屈大扬和中共中央军委情报部西南站重庆市负责人张祥娴参加了站的会师会，地址在重庆市上清寺原范绍祯公馆（即现在的市第二招待所）。会上，讨论了如何潜去成都、昆明和拉萨开展工作，迎接全国解放，派张祥娴、屈大扬立即出发去成都。屈大扬后因接受了参加建立巴县九区人民政府的任务，经组织同意未去成都。高雄辉、龚堪国等也同时参加了接管和建立新政权的工作。

二、接管旧政权建设新政权。1949年12月中旬，巴县人民政府派八、九区政府的指导员王增运、宋传坤、区长王介平、杨宝章，九区副区长周渭川一行，到三育小学找屈大扬参加该区的建政工作，负责区文教和南彭乡的政权建设。屈先后通知了杨麟书、彭兴宽、汤德言、许志洲、僧云诚、陈玉洁、温馨、赵正华、赵正荣、张正伟、石孝承、龚方书、龚方文、石崇鑫以及重庆育才学校派到三育小学任教的李成泰、郑云安、谌威林、赵知兰等30余人去九区各乡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开办人民教育，同时还输送了彭子玖、石孝雪、石孝友、石孝明、申守明、屈大廷、屈万福等10余人参军。

三、清剿暴乱土匪巩固新生政权。八、九区新政权刚建立，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于1950年春进行土匪暴乱，妄图推翻人民政府，复辟反动统治。周渭川同志在八区的土匪暴乱时，曾带领九区的武装工作队去太平乡背垭一带进剿土匪挫败了敌人。九区的土匪暴乱时，他曾在石岭、陈家、石庙、仁流、南龙等乡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他英勇善战，屡建战功。土剿进犯九区人民政府时，他随同区指导员宋

传坤、区长杨宝章各持一挺机枪，带领区武装工作队和机关的同志突破重围。指导员和副区长分别占领了政府正面东南两个制高点，杨区长占领后面文庙山制高点，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打退了敌人，保卫了区政府。在战斗中，牺牲了四位同志，其中两名解放军（名字记不清），两名机关工作人员。一是区会计马达。当他正在会计室取走数万斤粮票时，不幸被敌人的“神兵队”用刀砍死；二是宋指导员的通讯员，三育小学毕业生、解放社社员曾云诚同志。他在打死二名匪徒后，当正在瞄准第三个敌人时，不幸被另一敌人用枪击中头部而光荣牺牲。周渭川同志的左手和右腿都负了重伤，宋传坤同志的背被慌了手脚的敌人用刀背砍了一刀。1950年4月×日深夜，周渭川在石岭岗剿匪回区府时，只听关押在监牢里的土匪佯叫“土匪来了”，一片混乱，此刻区政府周围均处于战斗状态。正当周渭川同志登楼准备战斗的时候，却被我方人员的误枪击中而不幸牺牲。在土匪暴乱时，屈大扬兼任九区驻南彭乡工作组组长和乡剿匪委员会主任。1950年3月，在土匪进犯跳石区政府的当天，屈大扬在南彭乡主持了万人反匪大游行，粉碎了三保和石岗八保潜伏匪徒策应跳石暴乱的阴谋。在土匪进犯石岗乡的当天，屈大扬受命生擒了曾勋，此人是八区土匪司令部派遣潜入南彭乡与津巴蔡南清乡大队副石瑾怀策划暴乱的。屈同时还组织全乡民兵配合石岗乡转战到南彭乡的武装力量，布署在新店子黄泥塘一带与敌人决一死战。当敌人进犯到观音桥时，闻风丧胆，不打自溃，逃回接龙。不久，屈大扬又受命带领工作组的龚庆、陈东维和民兵彭光昭等人深入匪穴，秘密逮捕了跳石区中队里带枪（步、手枪各二枝）叛逃投匪当头目的胡家两兄弟，押解区府。1950年5月，屈大扬参加了攻打南龙乡土匪“九路军司令部”一战。记得区武装队在前进前夕，便埋伏

在左侧朱家村，信号是：当解放军正面用炮打燃匪哨所时，区武装立即冲锋配合，清晨激战一时许，匪徒全溃逃。我军打死敌人10余人，生擒30多人，从而摧毁了匪司令部，匪司令朱化南溃逃后潜入巴县石庙乡的一石洞中，后被民军捉拿归案，押解原籍綦江县正自乡处决。匪司令刘宗周潜逃去南川县神童坝，化装成贫农与街村妇女主任结了婚，任农协小组长，后被跳石乡民兵×××去买耕牛时发觉，由跳石区派员前往捉拿归案，当即正法。自南龙一战，摧毁匪“九路军司令部”后，巴县九区的匪乱始告平息。三育小学解放社社员有杨麟书、彭兴宽、赵正华、赵正荣、彭渠、朱大熹、费义纲、陈玉涛、张正伟等分别在跳石区各乡积极参加了剿匪斗争，为巩固新政权做出了贡献。

在庆祝解放四十周年之际，回忆巴县三育小学革命据点的斗争史实，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为迎接解放、建立政权而死难的同志们安息吧！如今巴山蜀水到处莺歌燕舞，一派大好春光。我们要继续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矢志不渝地为改革、开放、为“四化”建设，为实现人类的壮丽事业——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

曙光在望

刘清理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真是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往事历历在目。在这篇短文里，我将当年“青年先锋社”在中共地下党员领导下，为迎接解放所作过的一些工作作一回顾。

1947年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关键之年。我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领导下英勇奋战，迫使国民党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向陕北、山东两翼的重点进攻”。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蒋介石在政治上残暴统治，经济上压榨掠夺，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群众反蒋斗争情绪普遍高涨。而我军的部份战场，则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中共中央发出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出：人民解放军作战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中国革命新的高潮即将来临。在当时，公开的四川省委青年组张子英同志派地下党员谭紫光来到巴县跳石乡全善中学，建立和发展党的根据地，同行的还有地下党员唐以荣、张荫东和郑餐霞。他们与校长刘丙吉（民建中央常委）、进步人士胡世铭、严纪陵等密切合作，形成以党员为核心的领导力量。积极动员组织广大师生，投入振救祖国的解放运动。为在白色恐怖笼罩的险恶环境中，接纳掩护了“六·一”大逮捕、“挺进报”事件和云阳暴动等事变所撤出的三十多位同志就是一例。

1949年，解放全国的序幕已经拉开。蒋家王朝已经摇摇欲

坠，但他们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作垂死挣扎，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采取了“单线借读”的方法，把《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土地法大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挺进报》等革命书刊分别传给了赵朋华、廖祯华、陈明洁、刘清理和刘昌隆等阅读。随后，成立了以谭紫光任书记，赵朋华任组织委员，胡仕铭任宣传委员的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先锋社”。先后吸收了陈明洁、廖祯华、刘昌隆、刘清理、熊禾禄、李芳策、喻克模、张学美、严文楷、谢现全等入社。谭紫光根据《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起草了《青年先锋社章程》。章程特别强调青年先锋社的成员，要严格遵守纪律，保守党的秘密，联系群众、服从组织。谭紫光向我们分析时局说：“湖南、福建即将解放，四川、重庆的解放日期也指日可待，为了迎接解放，需要我们抓紧做许多工作。”又说：“为迎接重庆解放，成立一个党的秘密外围组织‘青年先锋社’是形势发展之需，以开展有组织的活动”。“青年先锋社”成立后，随即开展工作。

深入调查，开展宣传。青年先锋社成员都安排去农村作调查，宣传解放区的斗地主、分田地；分析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发动群众抗丁、抗税、抗租，迎接解放。胡世铭同志安排做争取教师的工作，並配合谭紫光同志指导“号角社”的活动。赵朋华同志分工抄写党的秘密文件、到农村开展调查，并负责做培养新社员的工作。陈明洁同志负责内勤工作，搜集、综合、整理、保管资料，开会看哨。廖祯华同志去石庙乡、仁流乡作农村调查、开展宣传并物色力量，重点调查地方武装。他曾去跳石中心校代课，监视翁跃光的特务活动，并争取进步青年教师。刘昌隆同志任号角社社长，负责全社工作，另负

责搜集江、巴、綦、南联防大队长刘宗周的反革命活动情况。熊禾禄同志从游击队回全善中学后，在跳石乡三保作农村调查。刘清理到石庙乡调查地方武装力量，并物色培养自己的骨干。当时为了对付解放重庆时出现的拉锯战，谭紫光同志一面派刘昌隆专门搜集刘宗周的反革命活动情况外，一面又派刘清理和廖祯华到石庙乡、仁流乡调查乡、保队副的表现及民间散藏的枪支弹药。我们以老师、同学、亲戚关系去做工作，结果争取了"反共保民军"分队副、伪乡队副、石庙乡代理副乡长等人。我们培养积极分子近四十人，解放后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到区中队当兵打土匪。

做上层统战工作，争取开明人士。跳石乡地方势力之间矛盾较大。龚庆章、龚永龄、翁卓甫、翁跃光、刘宗周等人最为反动，他们有权势，并与军、警、宪、特相勾结，镇压人民群众。另外，岳希颜、潘继岳、严纪陵、李启贤、张学蕴等比较开明。通过我们向他们做工作，他们都支持全善中学的工作，常为学校说公道话，同时使社会情况能经常反映到学校里来，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1949年11月28日，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过南彭乡，形势发展比我们预料的还快，还好。青年先锋社的同志们满怀喜悦心情，积极组织力量迎解放。11月29日上午，我们到跳石乡上场口去迎接亲人解放军。等候在校门口的师生，给解放军送上一杯杯热茶，贴出一张张标语，把巨幅《号角》墙报贴上了街。宣传队、腰鼓队和秧歌队在街上表演，后又下乡深入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新解放区的有关政策、法令，人心很快稳定下来，店铺开门营业，社会秩序良好。

纪念建国四十周年之际，我们缅怀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

的今天，理应珍惜革命成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